

我的川大 我的老师

——写在《重庆开埠史》入选《隗瀛涛文集》之时

□周勇

新年伊始,《隗瀛涛文集》进入“四川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文化传承创新项目”,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。全书140余万言,收入先生的成名之作《四川保路运动史》,再就是他带领我写的《重庆开埠史》,其余为先生自传及代表性学术论文。这让我我心中充满了暖意和敬意。

先生一辈子教书育人,立德树人,桃李天下,语言极富感染力。其中“平时莫来,吃饭的时候来”就是专门为这本书说的。40年过去了,它仍是那么清晰地响在耳边,激荡于心。

我是1979年考上四川大学的,那是“老三届”的末班车。那时的老师和学生都怀揣“担负起天下兴亡”的责任感在校园中拼搏,用“拼搏”形容一点不过,只要能读好书,教好书,做好学问,不论是师还是生,总是倾力所为,全力以赴。

第一学年结束,胡昭曦先生就带领我们几个本科生开始学做历史研究了。当时胡先生教宋史,也做四川古代史研究。他带着我做的第一项研究就是在1980年暑假调查《圣教入川记》和法国作者古洛东的情况。做完之后,便开始研究他在本科时就开启的“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”课题。

那时文献资料相当缺乏,我把川大图书馆中的相关图书几乎翻了个遍,但收效甚微。于是胡先生就指引我钻进了图书馆的线装书室。那时的线装书室完全不如如今的古色古香、安静典雅、崇高无比,而是屈居底层边上,原木书架,开敞放置,蓬头垢面,管理松懈,整天难见一二人。

但对我而言能近坐书架之旁,随取随拿,任意挥洒,得以把《光绪朝东华录》(记载光绪朝中的史料,220卷)、《筹办夷务始末》(收录道光、咸丰、同治朝涉外事务档案资料,260册)、《清季外交史料》(含光绪、宣统朝外交史料,273卷)翻了一遍,但凡见到与四川、重庆有关的内容就做成卡片,抄写下来。待天黑出门,满脸、满身黢黑,鼻孔里全是黑灰。

如是半年,我终于找到了一些感觉,凝练出“重庆开埠”这个选题——重庆开埠是四川和重庆近代历史的起点。但是前人的研究让人莫衷一是:重庆开埠的法律依据是什么,到

底是1876年的《烟台条约》,还是1895年的《马关条约》?重庆开埠的标志是什么,到底是条约的签订日期,或是其他什么事件?还有重庆开埠与近代重庆,乃至四川、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影响如何评价?等等。

我越发感到,要取得突破性进展,搞清楚重庆开埠的时间是一个关键。于是,就深钻下去。大约到1981年上半年,胡先生说,“你再往前做,我就不熟悉了,给你请位我的老师来带你。”于是他领着我去了隗瀛涛先生的家。

那时,隗先生住在桃林村,住房三间,但比较小,到处是书。先生中等身材,笑嘻嘻的,师母也很娴静和善,有一儿一女。落座书房后,胡先生说明了来意。隗先生问了我一些学习和家庭的情况后便说,“平时莫来,吃饭的时候来。”这让我一下子有点懵。但又不敢多问,只是记住,照办就是了。

慢慢地我了解了隗老师,也逐渐懂得了这句话的意味。当时正值百废待举之新时期,也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挣脱束缚、放手大干的新时代。1981年,国家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,先生正在撰写《四川保路运动史》,主编《辛亥革命史》中册,分分秒秒都不可闲抛。

再后来我更明白了,“平时莫来,吃饭的时候来”是隗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种特别的方法。既指他工作很忙,惜时如金,学生不要随便打扰,以便先生能全力攻关。又指学生不要完全依赖老师,要学会独立思考、自主研究,只有那些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去请教老师。当然还指,在吃饭时去请教老师,学生一定不会出现长篇大论,而只能捡最重要的问题,用最简练的语言提问;老师也同样,一定是把最关键的办法、用最精确的语言,解答学生提出的问题。再有,两杯下肚,微醺时刻,先生更是妙语连珠,要言不烦,点到为止,让你记忆深刻。这是一个相得益彰、效益最大化的办法。

按川大的规定,本科生到第三学年要写一篇学年论文,几千字足矣。我便准备以《论重庆开埠》为题。记得我是在1981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夜,坐在川大校园南边的临江馆开笔的。那里毗邻农田,安静人少,通宵可用。我从考证重庆开埠的历史过程、法律依据、开埠标志写起,然后再按照帝国主义的政治侵略、经济侵略、封建主义统治的变化,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等铺展开去。结果,一气就写了好几万字,完全不像一篇学年论文的样子。照这

个写法又收不住,真不知如何是好。

我只好去隗先生府上请教。他很认真地看了几天,然后把我叫去说,“你这篇文章已经有点专著的味道了,干脆写成一本书吧。”

这真吓住我了——一个在校的本科生,连论文都没写过一篇,怎么能写书呢?那可是高不可攀的呀!但先生当真,“不要怕,写!”

我还是不敢。因为我只研究了中英、中日关于开埠的交涉,以及开埠以后经济与社会的变动,而对由此引起的政治运动和斗争还完全没有涉及。隗先生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,“不怕,把我的东西全部拿去!”这样,他就把自己在研究四川保路运动史中涉及到重庆开埠后,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发生的辛亥革命运动有关重庆的史料,和他本人已经写入《四川保路运动史》的有关成果全部给了我。这让我用最快的时间补上了这一课,站到了学术研究的最前沿。

我真赶上了好时光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。为了正确认识重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责任,1982年3月,中共重庆市委以市委研究室和市经济学会的名义,召开了发挥重庆中心城市作用讨论会。

这是后来重庆计划单列的理论准备。会议组织者约请我的父亲周永林撰写《重庆经济中心的形成及其演进》与会。父亲知道我准备研究重庆开埠问题,他和隗老师的想法几乎一样,就是“要狠下功夫,不是写篇短文的问题,而是搞一本书的问题”,于是让我打下手。这篇文章于同年6月5日在《重庆日报》全文刊载。这更加坚定了我做好重庆开埠研究的信心,更深感青年学人的责任。

有鉴于此,我们确定了以重庆开埠及其影响为基本线索,着重叙述1876年《中英烟台条约》至1911年辛亥革命的重庆经济史和政治史,揭示重庆城市发展的特殊规律性,为确立重庆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提供理论支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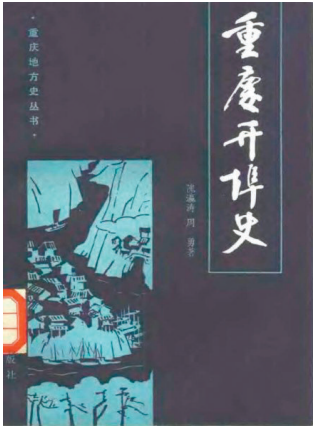
只一年多一点时间,我便完成了《重庆开埠史稿》。经先生精心修改,到1982年下半年这部书内部印行、1983年改名为《重庆开埠史》正式出版,因“《重庆开埠史》更是有关四川区域社会和城市研究的奠基之作,具有开创性意义”(四川大学出版社语),该书在1984年获得四川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,让我跨上了学术成长的第一个大台阶,也因此奠定了我后来学术发展

的基础。

可以说,《重庆开埠史》是在隗瀛涛先生和家父周永林的共同指导下完成的一份作业,是一部追随时代步伐,酝酿于桃林村隗家饭桌,诞生于临江馆,散发着酒香的学术著作。

40年过去了,隗瀛涛先生与家父均已作古,但《重庆开埠史》却与隗先生的成名作《四川保路运动史》一起被收入《隗瀛涛文集》,这对我而言是最为崇高的荣誉,感动、感念,难以言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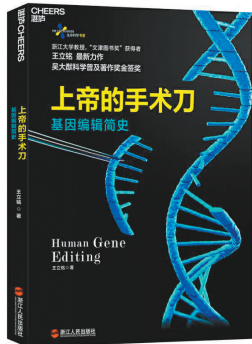
40年来,我始终没有放弃对“重庆开埠”的深入研究,1997年出了第二个版本;2019年根据这部著作拍摄的电视纪录片《城门几丈高》播出,好评如潮。2021年,我将启动《重庆开埠史新编》的研究,然后带领我的学生们,弥补那个时代的遗憾,再创一部学术精品,奉献给未来的40年。



《重庆开埠史》1983年版封面。



1982年,隗瀛涛先生运用中国近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。图为周勇(后排左二)和同学们与隗先生(前排左二)在四川保路运动纪念碑前合影。(周勇 供图)



□华勇

“亲爱的读者,你们也可以问问自己,人类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?”

《上帝的手术刀》作者王立铭在这本书的后记中,发出这样一个追问。

很多年前,达尔文在他的巨著《物种起源》中,明确提出物种进化和适者生存的理论,仿佛黑暗洪荒中的一道闪电,照亮了人类对生命探索的幽深小径。然而,还没等他回过神来,巨大的争议又把他抛进困惑的漩涡。

其中一个打他脸的手掌,来自一只安康羊。1709年,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牧民偶然发现自家羊圈中,有一只腿短、跳跃能力极差的小羊。这只小羊立刻被用来繁育更多的后代,这种安康羊腿短力小、温驯老实,无法翻越低矮的羊圈,非常便于牧民管理,最终成为优势种群。

1854年,一个叫孟德尔的奥匈帝国神父在修道院的后院种下一批豌豆。黄豌豆绿豌豆通过人工授粉后,居然全部结出了黄色的豌豆,第二年,这批黄豌豆种下后,又结出了黄豌豆和绿豌豆。神父一直种了七八茬豌豆,发现了遗传物质的显性性状和隐性性状。

这说明,不管多么微小的遗传变异,都仍然可以通过遗传因子的方式顽强地存在下去。

很明显,遗传变异和退化大量存在于生物界。

达尔文对此无话可说。但全世界的遗传学家、生物学家们却开展了一场围猎遗传因子的行动。

这个遗传因子,就是基因。现在我们知道,遗传信息的载体就是一种叫作DNA的化学物质,而且经过上百年的艰辛工作,科学家们终于弄清了遗传信息的传递方式,还绘制出了DNA的双螺旋结构图。

王立铭在这本堪称基因编辑简史的书,非常直接地提出,人类探索基因秘密的动力,大多是被人类克服自身疾病的现实需求给逼出来的。

人类的疾病,和我们身体内的遗传物质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比方一种叫囊性纤维化的遗传病,因为人类7号染色体上一个名为CFTR的基因发生突变,在北欧人群中发病率极高;再比如得镰刀形红细胞贫血症的病人,则是DNA序列发生了一个特定碱基分子的变异。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白化病、先天性唇腭裂、高度近视、高血脂、抑郁症……都是复杂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。

甚至还有一个会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结论:骨折,也是可以遗传的!

虽然外力撞击和意外跌倒等环境因素是骨折的重要诱因,但是,骨质疏松会显著提高骨折的风险。这么说吧,面对同样的撞击和跌倒,骨质疏松患者发生骨折的概率要大得多。

而骨质疏松的遗传贡献率至少在30%至60%。也就是说,如果你是一个骨质疏松患者,遗传的可能性是三至六成。

既然疾病与遗传有关,那么生物学家和医学家们就研究出了N多和基因相关的治疗方法。

因为基因缺陷致病,科学家们就想设法弥补上缺失的基因,这叫“缺啥补啥”;因为基因变异致病,就想办法让这些变异的基因恢复正常功能。还有,找不到变异基因怎么办?科学家们脑洞大开,居然请出了可以精准定位变异基因的“碎手指核酸酶”……这中间,最著名的故事就是“柏林病人”和小女孩希德瓦,被基因治疗完全康复的故事。

基因编辑的神奇之处在于,虽然经历了无数的失败与暗夜,但人类追求完美自身的希望就像吹鼓帆船的风帆,令人心驰神往欲罢不能。

我们会发现,利用最新的基因编辑技术CRISPR/Cas9,科学家已经开始向癌症、肥胖症、艾滋病、乙肝等疾病发起冲击。2016年10月,中国科学家们将肺癌患者的免疫细胞提取出来,利用CRISPR/Cas9技术修改了细胞中的一个基因。他们期待,经过基因改造的免疫细胞能够攻击患者体内的肿瘤。

迄今为止,我们看到的所有关于基因编辑的发展历史,完全可以说是人类中的英雄们努力理解自身、试图抗击疾病的奋斗史。

现在,请热血沸腾的读者们冷静下来。

基因编辑这把上帝的手术刀,当然可以给人类带来更辉煌的未来,但是,这把寒光闪闪的手术刀,也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灾难。

如果人类把基因编辑从“治疗”推广到“预防”的领域,甚至推进到“改善”的处女地,我们将面临医学、道德、法律、社会、伦理乃至人类命运的种种终极思考与决定。

这么说吧,通过基因编辑技术,你不会患上各种疾病,可以更健康地工作和享受生活。但是,如果你想要更健美的肌肉、更高挑的身材、更浓密的头发更挺拔的鼻梁,甚至你想要拥有更高的智商更强大的语言能力更缜密的分析能力呢?

我们在得到的同时,会不会失去了更多?

人们深切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。王立铭就在书中直不讳地指出,如果基因编辑技术没有严格监控与法律约束,会不会制造出大量怪胎和残疾婴儿?会不会破坏人类基因多样性?会不会导致人类彻底失去应对未来环境变化的生物学基础?

基因治疗和基因编辑技术应用的边界在哪里?人类什么时候该提醒自己——不要轻易挥动上帝的手术刀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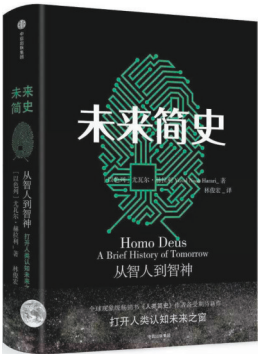
多年前,一位师长对我说,读书最好读有用的书、有趣的书、无用的书、无趣的书。

从不同的角度来看,《上帝的手术刀》四个维度几乎占全了。这是一本有用有趣无用却绝对会引人深思的书。

1996年,爱丁堡罗斯林研究所诞生了世界第一只克隆山羊“多利”。全世界为之震惊之余,几乎无一例外,所有国家政府都迅速通过了禁止克隆人的法律条文。有些欧美国家甚至连灵长类动物基因研究,也禁止了。和上帝抢手术刀,你不想清楚后果,敢玩吗?

站在公元3000年,回看21世纪的当下

——评《未来简史》



□张玉霞

以色列新锐历史学者尤瓦尔·赫拉利的《简史》三部曲,名列21世纪全球社科类畅销书榜单。仅以我们熟悉的中文世界为例,在号称文青集散地的豆瓣阅读排行榜中,《人类简史》(2014)位列豆瓣图书Top250之19、《未来简史》(2016)位列豆瓣十大热门社会学图书之四、《今日简史》(2018)位列2018年度十大社科·纪实之首,其影响力可见一斑。就写作风格而言,《简史》三部曲文笔风趣,可读性强,是很好的科普读物范本。

作为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、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,赫拉利有着一张

“非典型”的历史学者的面孔:青年怪才、学术明星、畅销书作者,他写书、做视频公开课、开设专栏,拥有网络世界大批粉丝。他擅长世界历史和宏观历史进程研究,有着人类学视野的“大历史”观,并侧重从演化生物学、认知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中汲取营养。在他的写作中,除科班的历史学之外,人类学、生态学、基因学等领域的知识信手拈来。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转换,是其作品最大魅力所在。

《人类简史》颠覆了我们关于人类进化的认知,《未来简史》掀起了全球关于人工智能讨论的热潮,《今日简史》涉及21世纪关乎人类命运的21个主要议题。而贯穿始终的主题,是作者关注个体幸福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使命、哲学追问和反思。

就我个人的阅读体会而言,《人类简史》有教科书般的严整体系,《今日简史》是灵光乍现的散论集,而《未来简史》是最令人惊艳的,有着很强的思维启发性和冲击力。本书站在公元3000年的角度,回看21世纪的当下,把“人工智能”这个热门议题以令人震撼的方式推到全球读者面前。

全书的核心观点是:在未来,科技可以操纵人类的欲望、感受和意识,甚至战胜死亡,人类面临的终极审问是——人,到底有什么价值?关

于未来,书中没有简单给出答案,而是基于现实观察不断提出各种问题,引发读者对习以为常的现实主动思考。

令人震撼的不是书中对未来的预判,而是作者基于历史发展规律对当下现实的冷峻观察和批判性洞见。经由本书,读者可以深刻理解“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”这个著名论断。

书中《第三部分 智人失去控制权》是被公认的精华所在。“无用的阶级”这个概念的提出,有种振聋发聩的警示作用,99%的人类将变得无足轻重,沦为无用的阶级:“就算这些无用的大众什么事都不做,整个社会也有能力喂饱这些人,让他们活下去。”“这些人对社会会毫无用处,整天活在现实与虚幻之间,这样的生命何来神圣?”“想要不被淘汰只有一条路:一辈子不断学习,不断打造全新的自己。只不过,许多人,甚至是大多数人,大概都做不到这一点。”

也许,你会认为这个结论过于悲观,但这只是一个历史学家清醒的现实主义思考。“在古代,力量来自有权获得资料。而到今天,力量却是来自知道该忽略什么。所以,面对这个混沌世界的一切,我们究竟该注意什么?”

在书的结尾,作者提出,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的兴起可能将改变世

界,但并不代表只会有一种结局。书中讲到的一切情境,都只是可能性,而非预言。如果你觉得某些可能性令你反感,欢迎运用各种新思维或采取新行动,让那些可能性无法实现。

从思考到行动的逻辑,对现实的积极介入和干预,这是一个历史学家的学术研究动力和历史使命感——所有的想法都要先改变我们的行为,接着才会改变我们的世界。

更令人欣赏的是,作者的批判性不仅仅针对外在世界,更是对自身的反思:“我们拥有越多数据,对历史了解越深入,历史的轨迹就改变得越快,我们的知识也过时得越快。”“研究历史并不能告诉我们该如何选择,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选项。”“这正是研究历史最好的理由:不是为了预测未来,而是要将自从过去中释放出来,想象是否有另一种命运。”

正是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思考,给予当前焦虑不安的我们一种鼓舞——认可人类过去的努力,其实传达出了希望和责任的信息,鼓励我们在未来更加努力。鉴于人类在20世纪的成就,如果以后人类仍然遭受饥荒、瘟疫和战争之苦……我们已有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,并减少未来受苦的概率。



百本好书
扫一扫
就看到



百本好书
扫一扫
就听到